

渠县文史资料

第九期

渠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渠县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章继肃

封面设计：蒋建有

渠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九 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编
四 川 省 渠 县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渠 县 渠 江 镇 马 家 巷 3 号)
电 话：(0818) 7322394—8809 邮 编：635200
渠 县 文 教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88 千
印 数 1—650

准印证号：渠文体内资(99)0003 号

政协渠县第十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主 席：覃孝章

副主席：李成全 何路全 谭世俊

毛林生 李守坤 覃治华

熊健全

秘书长：蒋志伦

《渠县文史资料》第九辑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谭世俊

责任编辑：王承全 刘隆菊 丁世泉

目 录

留在乡土上的珍贵足迹·····	陈建昕(1)
忆杨达纲先生·····	徐世崇(10)
忆冯秋二事·····	龙荣森(16)
渠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欧汉英(20)
琐忆解放初期驻渠解放军·····	史 鸣(26)
回顾大跃进的往事·····	徐浩昌(37)
渠县渠江大桥修建始末。·····	黄盛隆(41)
渠县供销合作社简况·····	李世忠(49)
渠县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卫生Ⅱ项目成绩斐然·····	雷建卫(66)
渠县文庙恢复记·····	郑恬 郑岁(73)
记渠县文管所第一任所长李星耀·····	李同宗(78)
渠县川剧团的三十三年·····	杨宇昭(85)
黄开富与育才学校·····	王荣成(96)
宕渠丧葬漫谈·····	常治伯(108)
宕渠婚俗·····	常治伯(114)
禁烟节纪事·····	李同宗(126)
三汇“心肺汤园”史话·····	杨治平(128)

留在乡土上的珍贵足迹

——怀念李绍文同志

陈建昕

得雍文莲同志电话：长期卧病的李绍文同志不幸于 1998 年 3 月 12 日 18 时 15 分，在华西医科大学医院停止了呼吸。

我与绍文同志在三十年代中认识于家乡，但彼此进一步相互了解，乃是在 1938 年秋我们同时就读于重庆沙坪坝开始的。从他一生的 87 个春秋看：属于清朝和民国 38 年，在新中国为 49 年。他为家乡和国家贡献了一生，当然以他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任高等院校的教授、系主任、总支书记、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院办公室主任、总务长、图书馆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并开设化工专业多种课程最为人称道。这不是一般的经历，也不是任何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如他的特殊贡献。四川联合大学于 3 月 16 日举行了遗体告别悼念大会，领导和与会同仁，对这位在 1944 年创办来仪中学就参加革命而获得离休干部待遇的绍文同志，无不钦佩其对党的一片忠忱，无不赞扬他工作勇挑重担而又一丝不苟，无不高度评价他治学严谨，生活简朴，为人刚正热情，光明磊落。

作为家乡人，我更觉得他在乡土留下的足迹给家乡的发展与繁荣，有着十分可贵的启迪和影响。

绍文 1911 年生于县城北街一个城市贫民之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由私塾而高小、而初中、而且又考入重庆川东师

范学校。1935年秋川东师范毕业回县后，由教小学而教中学，并颇受学生的爱戴与校长的信任。但他为追求进步仍决心继续求学深造，于1937年又外出考入重庆大学化工系。他从四岁在私塾发蒙读四年旧学，然后再读高小、中学到1941年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年中，虽中途迫于生计不能不两度辍学、而无论教小学、中学时，都总是边工作边自学，当然更不说对在学时的光阴是如何珍视了。所以在沙坪坝的同乡弟妹们，都很尊敬他这位老学长。他所学专业是化工，学成返县后，在楠煊中学无论教数、理、化都很受学生欢迎。1944年秋创办来仪中学，1947年秋又增办高中，在反动统治下人们要办任何好事、正事，都必然困难重重，更何况当时渠县地方派系斗争正烈，不知从何时起又被扣上“红帽子”，因而频繁地遇到想像之外的麻烦、干扰和破坏。然而他仍坚持教学，还为缺课教师去代上各科课程，可见他中学各科学得之扎实。尤为令人佩服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他被任命为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科大图书馆本是一所老馆，因文革的破坏，恢复开馆业务困难很大，特别是新调入的成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业务必需的古汉语阅读能力就更加贫乏。绍文同志就主动给馆内工作人员开课，系统讲授古文。消息传出，外单位也来了不少人听讲，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这为开展业务之需和后来评定专业职称都创造了必要条件。可见他学问功底之深厚。

绍文书读得好。但他绝不是只埋头读圣贤书，而不问窗外事的人。他早年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于1978年底我自昆明返川时，在成都去看望胡春浦同志，摆谈到家乡往事，我才知道他与绍文在渠中同读十一班。春浦说：“那时考棚虽小，情况却并不简单。我们毕业的1930年就已经有‘狮子狗’在狂叫

了。那时我们固然还不懂革命,但听到“狮子狗”那一套,觉得很讨厌,我和绍文就经常有意去惹狗、骂狗”(考棚,渠中开办初期校址,即今渠江镇小学。‘狮子狗’,当年的国家主义者,亦即后之“青年党”,早期所办机关刊物名《醒狮》,故对国家主义者鄙称为“狮子狗”——笔者)。从三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他以后,才更多地了解他,也就是我考上大学的1938年的那一个暑假,他还曾与唐毅(后始知为中共地下党员)联合各旅外同学组成我县第一个“暑期抗日宣传团”,由绍文任团长,在县城和主要场镇如三汇、临巴、清溪场、有庆等处作街头演说,唱抗日歌曲,演街头剧,刊出有漫画有诗文的壁报和黑板报。第二年暑假,仍联合旅外返乡同学并征得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根据上次经验,声势更浩大地以多种形式作抗日宣传。这两次宣传活动的所需用费和他们的生活费,都由参加者自己集资解决,未用政府分文。只是各地熟人多,一些乡镇的掌权者又多系渠中早年同学,工作上多有支持,有的也办招待。1940年暑假,则是以旅渝同学为主的“渠县夏令学习会”了。它仍是绍文为主要负责人,有熊扬、雍文远、陈见昕等参加,原期一个月,每天半日给学生补课,半日搞文体活动,无论课内课外,都紧密结合讲解抗日和革命形势,显然从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可恨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学习会被迫提前结束,未能全面完成学习宣传计划。

绍文194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受聘于私立楠煊中学。校长陈继虞对他很信任。学生对他的教学尤为欢迎。而他作为训育主任,除日常管理,却把“训育”的主导思想贯串在多方面对学生的循循善诱上。如他选择了一个很醒目的地方即由学生住宿的文昌宫,向下去教学区的文庙必经处那堵影

壁，请国文教员、书法家朱明哲老先生写了“走向光明”四个大字，雇泥瓦工精心刻塑为白底黑字。学生们每日数次上上下下，耳濡目染，自会在年轻的心灵中烙上深刻的印记。

就在绍文于家乡教育界声誉日隆的四十年代初期，胡春浦同志于42年夏回到了渠县。春浦同志原系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由于他的社会职业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私人开采黄金的“群生公司”经理，人们便误为是黄季陆的秘书，因而大竹专区和渠县地方党政头目，便都对有阿谀奉承，想依靠他为进身之阶，于是他成了“衣锦还乡”的要人，不但拟举办的“郑少愚烈士追悼会”工作十分顺利，而且由于他下榻于八濛书店，就在书店里设宴招待党政头目，甚至还有麻将和烟（鸦片）榻。这无异彻底开放了书店，从而化解了反动派对书店和经理杨景凡同志的疑心与监视。与此同时，春浦根据了解的县党部书记长胡俊生的处境，说服他必须依靠渠县青年力量，才能在渠县立足以摆脱外籍人在地方上的孤立局面，从而同意由绍文与景凡筹建“渠中校外同学会”，并在绍文与景凡的主持下，以校外同学会的名义，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郑少愚的球赛、戏剧、歌咏活动；在一些较大乡镇还建立了“渠中校外同学分会”，不少乡镇长都是“校外同学会”会员，对总会统一部署的活动，都能积极开展。但这却逐渐引起了伪县长唐锦柏的顾虑，担心将会对“政令”的贯彻构成威胁，于是千方百计阻扰“校外同学会”的工作，并终于1943年底被迫停止活动。绍文与景凡乃另组“渠县文化生活促进会”，不久又遭禁止。也就在这年的秋天，我回到家乡任教于楠煊中学。绍文与景凡和陈云龙同志等，根据春浦同志与胡俊生达成的接办报纸的协议，推荐我与毛良行去接管《渠

江报》。该报本由县府主办，胡俊生接过来作县党部的机关报。由毛良行任经理，我任总编辑。可是刚改为新《渠江报》出了三期，就在胡俊生为报社募集基金的宴会上，发脾气打了捐钱少的周德凯引起众怒，于是以“校外同学会”为主要力量，发动了“驱胡运动”，很快，胡被迫离县，伪县长唐锦柏便又攫回了报社，但仍由我们继续编辑出版，只把发行人由胡改为唐，而其中的周折，绍文和景凡、云龙等都参与了斡旋。从1944年秋绍文全力创办来仪中学起，常在邓家店，但只要入城，不但仍关注着《渠江报》，还同时共同筹建我们计划已久的“宕渠建设学会”，并比较顺利地取得唐锦柏的同意，在当年九月于渠江镇小学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选举绍文为理事长（唐为名誉理事长）。学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学会名义在《渠江报》主编了《渠县评论》半月刊，一律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建设新渠县，或有的放矢地针砭时弊，颇受读者欢迎。1945年5月，我们根据师生的检举揭发，并经记者核实，有凭有据地准备发表渠女中校长黄智薇贪污的材料，并配以题为《黄智薇哪里去》的社论。绍文入城例行来到报社，他读了我们的稿子，建议消息照发，社论缓登。我们只觉得理直气壮，而对反动派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估计不足，没有接受绍文的建议。果然，报纸一发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黄智薇的贪污与银行董事长、县参议会议长谢济安有牵连，主管学校的县长也不能辞其咎，于是唐锦柏再也不像以往那样不买县党部书记长刘正泉的帐，而听任其下令查封了报社。在终于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我们移交报社后，以《渠县评论》为“宕渠建设学会”主编，而非报纸副刊为由，单独出版，绍文任发行人，我作主编，但也只出了三期，仍被迫停刊。绍文回顾其影响说“《渠县

评论》不过是个八开版面的刊物，但它起到了正义者快、邪恶者惧的作用。”

绍文在积极办学的同时，还与共产党人杨景凡、毛良行等密切合作，于1945年、1947年打入国民党撑持民主门面的第一二两届县参政会，与其中的民盟成员及其他进步青年，形成会内的强大左翼，利用其合法讲坛和地方派系矛盾，起着为地方兴利除弊的作用。如先后对伪县府满口别字、工作低能的社会科长萧济华，以及田粮管理处处长邓铁铮、余楷模、科长陈江、渠中校长杨挺生、女中校长李仲先、民政科长刘晋卿等的劣迹与贪污一系列的弹劾和检举，使他们丢官的丢官，逃跑的逃跑，弄得党政头目十分狼狈，而另一面则是人心大快。其间，1946年春，绍文与熊杨、杨达纲同志等在渠县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渠县分部由杨达纲为负责人，他任秘书，陈云龙、周孟基管组织，杨常凡、杨秉五管宣传，并以“白濠州”的化名与盟省委直接联系。

纵观绍文在家乡工作的七年多，既以其所学尽心竭力服务于桑梓，培养更年轻的一代，更倾注着对故土的热爱，紧跟时代步伐创造美好未来。实在是爱乡爱国的青年楷模。

关于创办来仪中学，1996年冬我去四川联大探视他时，曾对当年办学动机和办学思想有所探讨。他说，楠煊的陈继虞校长对他确实很重视很信任，如果稍加示意，拿超双薪的待遇亦无问题；但继虞似乎一办起“楠煊”就有功成名就之感，已缺乏进取精神；而且抗战时期崛起的私立中学，实是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状态，学米、尊师米和住校食米的负担虽重，而生源仍旺，以致有“学店”之美溢。他觉得囿于孔庙中的楠煊办不出自己的特色。当然，雍熙文要办的“雍氏中学”和春浦的积极推

荐，是一个机遇，而我们筹划已久的“宕渠建设学会”蓝图中，也有办学的规划，目的是要为家乡培养有建设新渠县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他说，抗战以来，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代启示了他，长期与唐毅、春浦、熊杨、景凡、云龙、天锡和文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更强烈地影响着他。他要办的新型中学，必须是一方净土，让思想进步而又学识丰富的教师全身心地教，让莘莘学子能扎扎实实为建设家乡不遗余力地学。所以一开办他就警惕着地方习惯势力和反动党团对学校的干扰。所以他一直抵制了任何初中都必须建立的“童子军”；也巧妙、有力地抗住了建立“三青团”组织的压力，直到增办高中以后，只是由于教职员中本来就有几个挂名国民党员而不能不在刘正泉的通知下，建立个国民党区分部，便选举杨楚章为区分部书记。而杨是位年已五十多岁的国文老先生，当时正集中精力在课余写章回小说《祸水谷》。他深感绍文品学兼优，办学有宏远目光而又为人正直无私，所以他虽也受刘正泉的指令，实际只应付了一些例行表报，未起到他区分部对学校的干扰破坏作用。

当然，既有一个“区分部”，绍文也未放松过对它的警惕。他对自己前前后后的教职员队伍，设身处地替杨楚章作过分析：他知道，周孟图、朱化平、朱颖，都是北门场的老街坊；熊杨夫妇和熊涛、陈见昕都是沙坪坝的同学；杨秉五、张一若、毛良行是与杨相识的老熟人。至于外来的任乃忱、关明孝、张继凡、杨国光虽是初识，但他们都在业务上过得硬，又很受学生欢迎，所以不大顾虑杨对他们的怀疑。而来去的客人虽多，无论是外来的雷雨田、谈剑啸，本地的陈云龙、杨景凡，在有好客风气的我县，早有喻美文“三六楠牙醉”的诗句传诵于各校中，兼

之警察局科长张天锡又常年借住于来仪，所以来去客人众多的现象也未出现过破绽。绍文说，倒是一开办就聘为教务主任的伍福程这个两面派长期未被识破，一则他对绍文事业正上升时期，一贯表现为积极忠诚，一方面他与熊涛又是遂宁师范同学颇想通过熊加强与旅外归来者的关系，以为他将来跻身县上政坛创造条件。直到1947年下期，县上各群众团体换届选举，伍征得绍文同意，去参加县教育局的竞选，未被选出，他就牢骚满腹地对熊涛说：“他妈的，未必北派就不是人参加的！”从此才识破他这个国民党员比区分部书记更危险的人物。果然，当1948年秋绍文被迫离校后，他就原形毕露，与代理校长、原渠县特委会秘书熊昌乾相勾结，妄图检举尚未离去的进步教师来为反动派立功了。

当然，在当年的国统区要办一所不让“三青团”组织进入的中学，谈何容易。但是毕竟办到了。这是因为绍文在渠县教育界颇孚众望，办仪的成绩有口皆碑，反动派无奈他何。同时也因绍文和当时的革命进步青年，善于利用党政矛盾和地方派系矛盾，能赢得擅搞左右逢源的伪县长唐锦柏的相对平衡。所以，在表面场合总是点头敷衍的反动派，早就捕风捉影地上报材料，把来仪中学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不断唆使人制造麻烦，妄图破坏。如1945年秋刚由邓家店迁入城南新校舍之际，伪军官张以秋就怂恿一些拜佛老太婆出面，说在铁佛寺办学是对佛教的破坏，吵闹不休。实则来仪新校舍建在寺后大操场边，在校舍未全部竣工前，只借用了空厢房一部分住教师，而寺内的佛事活动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刘正泉勾结在“三青团”中央供职的何修义，利用由舒传玺主编的渠县旅渝同学会会刊《渠县人》，抛出对来仪和李绍文校长的诬蔑中伤文章。尤

其是1947年下期，国民党军警突然在学校出入要道，架上机枪，突击搜查，1948年秋，“龙潭起义”失败后，重庆内二警又一次武装入校搜查。在镇压起义的反动武装尚重兵压境之时，伪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又率人马来到渠县，在“接官厅”的迎接仪式中，当刘炳中介绍到“这位是来仪中学校长李绍文”时，王陵基一反常态，摘下墨镜才伸手相握。这无异他自己透露了危险信号，于是，欢迎队伍一解散，绍文便离校出走，反动派策划的迫害又一次落空。

绍文到成都后与春浦、熊杨取得联系，并接受了工作安排，积极投入革命活动。不久意外与县人、特务分子毛天鹏相遇，便于1949年1月20日以“华蓥山龙潭暴动匪首嫌疑犯”罪名被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关押至同年7月才释放出狱。然后党派绍文同志去雅安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绍文作为渠县青年对乡人最可贵的启示，是他还在黎明之前近十年时就以“走向光明”与学生共勉，且一身正气从不与邪恶妥协，严格说，他真正迈步于光明大道上，是从入党开始的。

绍文同志的一生，是为事业而艰苦奋斗的一生。从他在解放前后的经历看，堪称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不但在入党后的近半个世纪为我国高教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入党前的奋斗，也有力地说明了一个有志青年必须把个人的志向溶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目标，才能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体现自己人生价值，实现“有志者事竟成”。

绍文同志是我们应当永远怀念的。

（作者单位：绵阳师专）

责任编辑：丁世泉

忆杨达纲先生

徐世崇

杨达纲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深固、曾祖父平政，分别为补廪膳生和贡生，其近世祖铭珠曾以进士授湖广松滋知县，三叔世昌，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曾任渠中校长、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同辈兄妹及子侄据有大专文化的有十一人，其中有厅局级干部二人，教授、副教授三人，据有其他高级职称的有三人。世代家训素以耕读为本教育后人。父早逝，母性刚直，家教甚严，而达纲先生自幼敏而好学，也极为孝道，凡事必曲意顺承，颇得慈母欢心。在读大学和毕业以后的工作期间，多在远离故土的西昌、江安、富顺、南充和成都等地，往往长期不能回家侍奉老母，幸有其贤内助代国兴的细心照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样尚能减轻达纲先生在外挂念老母的赤子亲情。一旦寒暑假的来临，那便是心猿意马，归心似箭飞也似的来到母亲身边道一声母亲好。平素就是端茶递水、问寒问暖，深得老母欢心。1946年夏因公来成都在商业场购得皮衣一件置好后，并亲手给母亲穿上的亲切感人场面，很快就传遍近邻，一位老者深有感触的说：“杨达纲在家是个孝子，在外是个好官（指参议长职）。”

他1931年夏毕业于国立成都大学。同年秋到1946年夏先后在广汉、西昌、成都、江安、富顺和南充等地的中师和普中任教。其间先后两次出任渠中校长。他在地教学和教学管

理工作的情况我知之甚少,但他第一次长校渠中时,正当我在那里念初中,他教我班语文,据我回忆,他衣作整齐、温文,两眼有神,初见时有令人生畏感,实则谦虚和蔼。作为一校之长,事务繁忙,但从不放弃教学。他知识面广,语言生动,对学生要求严格,为训练学生的速写能力,常要求两小时作文当场交卷。他治学严谨,有一套教学管理才干,在每星期一的周会上常常是大声疾呼……渠县中学是渠县唯一的一所中等学府,你们要好好学习,一方面为进上一级学校作好准备;一方面也要为走向社会作应有努力。你们要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为转移风气,移风易俗改变家乡面貌发挥作用。要求学生衣冠整齐,常说:“衣冠不整柜心之证也”。也要求学生读书和做事都应有吃劳精神。并常说:“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也”。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 30 年代他第一次长校渠中时,除个别水平较差的教师外,其余上届全班人马包括核心人物事务、教务两大主任在内一律全聘。一心只想办好学校,不想从中谋取私利,其治学精神为多数师生所敬仰,是一位好校长,也是一位好老师。

解放初任川东行署委员,1953 年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同期调民盟省委机关,先后担任秘书处副主任、副秘书长,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期间,长期住在宽巷子 30 号既不宽敞又不配套的私房,从不向单位提出合理的住房要求。到 80 年代初才搬到枣子巷 71 号的省政协三室一厅公房。按其职称居住面积还是不够,但从不开声叫苦。而他的生活原则是物质条件向下看,奉献精神向上看。所以他认为衣求蔽体保暖,食求果腹保健;对住房认为:“室雅不在大,朴素更温馨,心底无俗气,衰老亦青春。”他有一个四代四堂三十六人儿孙绕膝十